

# 作為方法的社會史

## ——社會史研究的七個命題

孫 江

---

[提 要] 從全球史學思想的“共振”和“連動”的角度回看社會史的演變,被標識為新史學的社會史發軔於對 19 世紀形成的現代史學的批判,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導向是其兩大印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思想和時代的波瀾中,社會史儼如萬花筒,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樣貌;在追求研究精確度的背景下,不能量化的歷史就不是科學一度被學人奉為圭臬。20 世紀 70 年代,社會史沿著文化人類學的視線,重新關注主體的情感、思想和行為。而在 80 年代“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人們驀然發現社會史的“社會”竟然是在想像力中不斷被再生產的。“社會”在開始“去自然化”的同時,也宣告了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的落幕。

[關鍵詞] 社會史 年鑒學派 唯物史觀 整體史 新社會史 後社會史

[中圖分類號] C91-09; K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05 - 22

---

1987 年,《歷史研究》第 1 期刊登的署名“本刊評論員”的文章——《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揭開了社會史在中國“復興”的序幕。從今天的角度看,文章題目中的“歷史的內容”和“歷史”到底是什麼關係,似有討論的餘地。撇開這點不論,有兩段文字值得咀嚼:

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教條主義的束縛和“左”的思潮影響,人們在理解和應用歷史唯物主義從事史學研究時出現了偏頗和失誤,將社會生活這一重要歷史內容的研究視為“庸俗”、“煩瑣”而逐之於史學門檻之外,並且美其名曰捍衛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性和科學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突破流行半個多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斷代史等著述格局,從研究社會生活的角度著手,開拓和填補鼎足之下的邊緣地帶和空白區域,同時再以社會生活的歷史演變為中介,連接和溝通鼎立的“三足”,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之血肉豐滿,容光煥發,改變以往史學那種蒼白乾癟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實和完善。<sup>①</sup>

前一段文字反省了以往中國歷史學的“偏頗和失誤”,指出無視社會史(社會生活)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性”和“科學性”,與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回顧國外的社會史研究,隨處可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身影,美國學者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甚至發問:“它(新社會史)是左翼意

識形態的特產 (product) 和‘所有物’ (possession) 嗎?”<sup>②</sup>但是,如果將伊格爾斯的問題放在馬克思主義影響力頗為強勁的戰後日本史學界來看,問題似乎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一部分左翼學者為了尋找大眾的主體性,將目光轉向社會史;而另一些左翼學者則批判社會史以“個人興趣”、“自我本位”為取向,放棄了把握過去和改造世界的歷史學的本旨。<sup>③</sup>

後一段文字將社會史等同於社會生活史,並且與經濟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相提並論,這觸及到何謂社會史的問題。德國學者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曾打過一個頗有意味的比喻:“社會史這一術語猶如一根橡皮筋,涵蓋了幾個不同的領域。”<sup>④</sup>這句話有兩層含義:其一,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關涉社會結構、社會進程和社會運動;其二,社會史研究整個歷史,是對歷史的一種特殊理解。社會史到底屬於某個或某些領域,還是指歷史本身,在倡言社會史的學者中一直存有意見分歧。

回顧中國社會史的“復興”之路,如果把歷史學喻為王冠的話,社會史堪稱王冠上的明珠。三十六年來,社會史在中國歷史學中獲得了不容置疑的位置。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包括對上述兩段話的理解在內,中國社會史的方法論意識淡薄,有些自稱社會史的研究嚴格地說是反社會史的。值得思考的是,社會史在中國“復興”之時,恰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漸漸落幕之際。以下,筆者根據自己有限的粗淺閱讀,以關涉社會史的七個“命題”(These)為中心,概觀作為思想運動的百年社會史。

## 一、錯過的約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英國輝格史學大家屈維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 問世。該書完稿於 1941 年,由於戰時紙張緊缺,先在美國出版,1944 年復在英國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在隔海相望的法國,費弗爾 (Lucien Febvre) 於 1948 年談到該書時,暗示布洛赫 (Marc Bloch) 曾計劃撰寫《法國社會史》,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戰爭,早就有“法國版”的社會史了。<sup>⑤</sup>

費弗爾所言不虛。1929 年,費弗爾和布洛赫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鑒》(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以下簡稱《年鑒》),發刊詞《致讀者》(À nos lecteurs) 所張揚的打破時代界限和跨學科研究理念,開啟了新的學術風範。<sup>⑥</sup>在《年鑒》問世前後,二人及同道業已積累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布洛赫著有《封建社會》(La société féodale, 1939-40) 和未完成的《法國農村社會的基本性格》(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等。正是有戰前的基礎,《年鑒》雜誌才得以在戰後迅速再出發,進而催生了“年鑒學派”——準確地說是“年鑒運動”——的誕生,使“年鑒學派”成為法國歷史學靚麗的名片。1981 年,美國學者金瑟 (Samuel Kinser) 把“年鑒學派”置於法國近代思想和史學的脈絡中來把握:“在布羅代爾的身後,站著的是布洛赫和費弗爾;在第一代年鑒派學人的身後,站著的是皮朗 (Pirenne) 和維達爾 (Vidal); 在二十世紀初的有機科學背後,響徹著以個人的心、聲和魂為民族榮耀的浪漫主義史學的真理。最後,在米什萊 (Michelet)、梯葉里 (Thierry) 和基佐 (Guizot) 的身後,是孔多塞 (Condorcet)、盧梭 (Rousseau)、狄德羅 (Diderot) 和其他啟蒙運動先驅的人文科學。”<sup>⑦</sup>然而,人與其說像其父親,不如說像其時代。<sup>⑧</sup>布洛赫在其未完成的遺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中曾援引過這句阿拉伯諺語。確實,如果將《年鑒》放在同時代歐洲思想和史學語境裡來考量的話,“年鑒學派”既是法國過去思想連續性的產物,更是當下思想“運動”的結果。2015 年出版的舍特勒 (Peter

Schöttler)《“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 *Die “Annales” - 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揭示了《年鑒》與德國史學鮮為人知的關係。<sup>⑨</sup>

被中國學者奉為主臬的“年鑒學派”，對鄰國的影響遠沒有想像得那麼大，原因在於各國都是在自己的史學脈絡中推進研究的，如英國學者專注於個案研究，對“年鑒學派”偏好的抽象集合概念敬而遠之。<sup>⑩</sup>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後，德國(西德)史學界才真正關注“年鑒學派”。在了解了“年鑒學派”的來歷後，有些德國學者開始私下嘀咕是不是“德國的舶來品”( *ein deutscher Import* )。博克曼(Hartmut Boockmann)說：“《年鑒》歷史學家除了給德國人的發明貼上法國人的標籤外，沒有做別的事情”；“後來在德國出現的法國範式實則為出口轉內銷”。埃爾澤(Reinhard Elze)認為，“年鑒學派”倡導的“整體史”( *histoire totale* )來自德國的“地方史”( *die Landesgeschichte* )。在眾聲喧嘩中，人們發現“年鑒學派”踐行的不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而是韋伯的足跡( *die Spuren Max Webers* )。<sup>⑪</sup>

舍特勒是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曾在法國教過書，在美國做過訪問學者，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由導論和三編 18 章構成，第一編講“年鑒學派”與德國的關係，第二編論及對象包括皮朗(Henry Pirenne)、貝爾(Henri Berr)等，第三編討論布洛赫和費弗爾對德國歷史學的批判。舍特勒在書中披露了很多鮮被提及的事實，在《年鑒》誕生前，荷蘭、美國、英國和波蘭都有嵌入“經濟”和“社會”二字的學術刊物，德國甚至還有與《年鑒》近乎同名的刊物——1903 年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季刊》(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在考察布洛赫在萊比錫和柏林留學足跡時，舍特勒注意到布洛赫與德國歷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的特殊關係。布洛赫對蘭普雷希特的研究產生共鳴，更為其激情四溢的演講深深地打動。

既然“年鑒學派”與德國史學有著如此密切關係，緣何鮮為人知呢？舍特勒認為 1930 年代歷史學的民族主義化致使《年鑒》學人與德國史學界的關係疏遠。這無疑是正確的。翻閱 1935 年出版的費弗爾《萊茵河》一書不難感到書中洋溢的民族主義情緒。<sup>⑫</sup>儘管如此，筆者更傾向於認為與“二戰”後當事人費弗爾刻意迴避談及早年的事情有關。2016 年 6 月 16 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中心與巴黎德國歷史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場關於舍特勒著作的研討會，與會七位學者的發言被摘編刊發於《20 世紀：歷史雜誌》(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 上。對於“年鑒學派”與德國歷史學的關係，人們認為這段複雜而迷人的歷史之所以未被挖掘出來，其原因乃是認識的不對稱，即德國學界認為早期“年鑒學派”受到德國影響，而法國學界對此不屑一顧，這是一次“錯過的約會”。<sup>⑬</sup>

其實，如果撇開歐洲中心的認知方式，將目光投向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日本，不難看到另一個“錯過的約會”。早在 1922~1924 年間，日本至少出版了三本名為“日本社會史”的著作。1922 年佐野學出版的《日本社會史序論》是用唯物史觀詮釋歷史的著作，<sup>⑭</sup>關於該書後文將專門討論。1924 年，經濟史學家本庄榮治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將社會史研究的內容概括為四點：整個歷史；與社會學相重疊的人類集體的歷史；組織和公共問題；社會問題。<sup>⑮</sup>本庄的社會史內涵寬泛，帶有“整體史”的特徵。歷史學家喜田貞吉在其創辦的《社會史研究》雜誌上刊登狐狸附體等民俗學方面的文章，對此，1923 年本庄在《歷史與地理》雜誌上撰文予以批判，認為《社會史研究》雜誌名為社會史，實則是對社會史的濫用。<sup>⑯</sup>次年，喜田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何謂日本社會史》予以回應，譏諷本庄的社會史是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中的社會組織，準確地說應該稱為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他認為日本自古而來的社會組織的起源、沿革及其相伴而生的現象，應該成為社會史研究的“本

體”；經濟關係涉及社會諸問題，傳統和情感可能產生反經濟的利害，因此不能僅從經濟上考察社會，這是唯物史觀觀察人際關係的弊端，“在某種意義上褻瀆了人”。<sup>⑩</sup>1929年，也就是《年鑒》誕生的同年，歷史學家瀧川政次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帶有左翼思想的作者反對將社會史視為“國家社會”、“教團社會”，認為社會史應該與經濟史、法制史相並立，研究各個時代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的發達與變遷，因為研究社會組織時不可避免要觸及社會階級，因此社會階級的發達和變遷也是社會史的組成部分。<sup>⑪</sup>

由上可見，早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即已從歷史學、經濟學、民俗學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社會史展開了廣泛的研究，涉及後世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很多問題。也許有讀者會問，何以日本社會史研究能居於同時代的前沿？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走上建設現代國家之路。19世紀末，呼應現代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皇國史觀”應運而生。所謂“皇國史觀”，就是把日本歷史納入萬世一系、恆定不變的天皇譜系中，強調對天皇盡忠是每個國民的美德。在維護天皇神聖性的前提下，現代史學的主題是政治史（“國制史”）。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特別是1912年日本由明治時代進入大正時代後，民族主義思潮回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國家對公共價值的獨佔；而伴隨著政治上的普選要求和廣泛的勞工運動的展開，人們將目光投入與國家有別的領域，於是有了20世紀20年代“社會的發現”。<sup>⑫</sup>日本的社會史在這個時期興起，可以說與“社會的發現”不無關係。撇開上述四位學者對社會史理解的歧義，取其最大公約數，社會史均被界定為有別於政治和國家的歷史，日本的社會史的出發點與德國、法國的“經濟社會史”視域下的社會史異曲而同工，社會史的呱呱墜地可謂東西思想上的“共振”現象，這告誡論者有必要從全球範圍而非單一國家或單一學派角度思考和定位社會史。

## 二、被埋沒的人民史

在將社會史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的論者那裡，有的將社會史定位為與政治對峙，有的稱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並立。前者來自馬克思主義或伊格爾斯所說的左翼思想，體現了社會史與生俱來的批判性格。18世紀末，當“雙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工業化——衝擊歐洲的舊秩序時，“社會”（social）這個概念是帶有批判性的。<sup>⑬</sup>19世紀產生的社會學，希望通過分析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的內在機制，以便開啟由理性所設計的未來，因此社會學（社會史）被視為帶有“批判性的反體制的學問”（kritische Oppositionswissenschaft）。<sup>⑭</sup>在政治史主導下的德國，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現代/傳統史學排斥社會史，社會史屬於“孤立的邊緣學科”（separates Randfach）。<sup>⑮</sup>舍特勒《〈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提及青年布洛赫一件事，在1908~1914年布洛赫加入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赫爾茲（Robert Hertz）創立的社會主義學生團體，並且持有黨證。<sup>⑯</sup>布洛赫的早年經歷暗示“年鑒學派”創始者的問題關切與社會主義者的訴求是有交叉的。<sup>⑰</sup>

與上述與生俱來的“反政治”傾向不同，社會史還有基於特定意識形態與政治對峙的特質，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史訴求。美國學者林·亨特（Lynn Hunt）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學歸為四個範式（paradigm）：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年鑒學派和美國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sup>⑱</sup>在四種範式中，馬克思主義範式最容易把握，因為它來源於一個人的思想。這種範式以物質的、經濟的生活關係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不僅要認識世界，還要改造世界。在社會史研究上，佐野學可能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詮釋歷史的，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被埋沒的人民史”（埋沒された人民の歴史）。

佐野學(1892~1953),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學生,1917年畢業後攻讀兩年農政學課程,1919年成為“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契約職員。在學期間,佐野學對蘇俄革命甚感興趣,撰寫過關於俄羅斯農村共同體“米爾”(мир)的文章;畢業前後,在左翼學生組織“新人會”的機關雜誌《德謨克拉西》上,佐野學用真名或筆名發表過關於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和蘇俄革命的文章;<sup>25</sup>在《解放》雜誌上刊文呼籲解放日本受歧視的“部落民”。<sup>26</sup>佐野學經岡上守道的介紹,加入麻生久組織的“木曜會”。1919年6月,三人以“石川六郎”筆名出版了《過激派》一書,這是日本第一本介紹蘇俄革命的著作。<sup>27</sup>

在《日本社會史序論》一書序言中,佐野學指出:“將以往的歷史著作皆批判為政治史並非不當。治者群以政治為業,被治者群以勞動謀生。政治雖為重要之社會現象,但如無勞動生活,則社會生活難以維繫。要撰寫真正的社會史,就必須揭示被治者群的歷史。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追溯其與當代的連動,這不僅有助於正確理解當代社會的性質,還有助於把握將來社會進化的方向。”“我要去除纏繞於日本史的神秘要素、觀念要素和詩歌要素,將其還原於赤裸裸的經濟關係和支配關係中,與此同時,發現人與人等價交換勞動的魅力及共存關係的諸形態。”<sup>28</sup>基於上述認知,佐野將該書分為被統治者、統治者、社會生活三編,在被統治者部分專門敘述日本歷史上的“一揆”——造反,認為“一揆”是“一群徒黨紛紛拿起武器將集體意志和情感訴諸武力的現象”。<sup>29</sup>“一揆”不是英文裡的riot(騷亂),應譯為rising(起義)。佐野學把一揆分為三類:侵略性的(武士階層的)、宗教性的(僧侶集團的)、階級鬥爭的(典型的一揆、土一揆、百姓一揆、米一揆、町人一揆),指出“一揆”的發動者只是“徒黨”,所進行的不是大規模的暴動,與革命運動根本不同。<sup>30</sup>

佐野學基於唯物史觀的社會史敘述在日本史學史上堪稱先驅,但是,佐野學及其“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命題猶如史學史上的失蹤者鮮有人提及,這與其政治生涯有關。1922年佐野參加日本共產黨,1927年當選為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佐野學被捕入獄,不久與同志登報聲明“轉向”(脫黨),潛心研究佛教。1943年佐野學出獄,1948年出版《唯物史觀批判》。<sup>31</sup>但是,從全球視野看,佐野提出的“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命題值得重視,它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敘述,而將這種敘述推向極致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1928年3月22日,蘇聯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機構會議上作《蘇聯十年間的社會科學》報告:“所有這些契切林、卡韋林、克柳切夫斯基、丘普羅夫、彼得拉熱茨基,他們都直接反映了十九世紀在俄羅斯發生的某種階級鬥爭,而且正如我在一個地方所說的那樣,這些先生們寫的歷史別無其他,只不過是過去被推翻的政治,即當時激烈的社會鬥爭,1861年支持和反對農民的鬥爭,19世紀70年代的民粹主義革命等等,所有這些都在社會學的文獻中被直接表現出來了。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的背景,這些文獻就無法呈現。”<sup>32</sup>同樣的句法也見諸毛澤東作於1949年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毛在文中寫道:“什麼是歷史?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sup>33</sup>

佐野學雖然被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遺忘,但“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的命題並沒有因此而被“埋沒”。1946年,標誌著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再出發的石母田正的名著——《中世世界的形成》出版,通過這本作為戰火下的著作,作者表達了破除“皇國史觀”的訴求——“我們祖國的歷史絕非那麼貧乏”。<sup>34</sup>這位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旗手曾說過,歷史研究在戰前是最受壓抑的一門學問,現代史學是“皇國史觀”和國家意識形態的附庸,其“成人式”始於1960年代。<sup>35</sup>在日本,“戰後史學”一語有特定的含義:(1)將世界史視為由普遍發展法則所呈現的科學主義的產物,(2)

以國民為單位的發展階段論，(3)重視對歷時性的內在一貫的封閉結構的分析，(4)析解以階級和民族為基本範疇的主要勢力，(5)尋求變革的強烈的目的論。<sup>⑧</sup>60年代後半葉，人民鬥爭史成為日本戰後史學的主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試圖從歷史中尋找解放生產力和主體的動力，由此有人脫離了僵化的理論預設，轉而嘗試理解主體의思想和行動。

網野善彥是典型的例子。1947年網野進入東京大學學習，1950年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曾長期在中學任教。網野從自然=“無緣”角度關注共同體之外漂流的人群，指出在社會表象的背後有更為廣大的、未被彰顯的“無緣”社會，這個社會擁有未被文字書寫的歷史，但研究者可以通過地下出土的文物、壁畫和畫卷等來描述。<sup>⑨</sup>網野所說的“自然”是有主體的自然——人自身、肉體、性、性別等，如果從這一視角觀察日本的中世紀，則可以發現很多被遺忘的歷史，那是與來自中國文明的以文字為表徵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歷史。網野儘管被學界公認為社會史研究的代表，但他本人從未自稱從事社會史研究。網野篤信馬克思主義，但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對此，網野的友人、同為日本中世紀專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永原慶二批評他：雖然批判“進步史觀”，但與戰時浪漫派的歷史觀存在內在聯繫，是一種“空想的浪漫主義歷史觀”。<sup>⑩</sup>

與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對社會史存有意見分歧不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傾心於社會史研究。英語“社會史”(social history)出現於19世紀中葉，1874年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出版《英國民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不久擴充為五卷本的《英國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的話，戰前馬克思主義者莫頓(Arthur Leslie Morton)的《英格蘭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是一部體現社會發展論的名著。莫頓認為，從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英格蘭歷史是由各階層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sup>⑪</sup>“二戰”後，英國左翼歷史學嶄露頭角，出現了“勞工史研究協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1952年創刊的《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及以牛津大學學生宿舍為陣地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鍾情於社會史，是因為來自英國歷史的研究顯示出與經典作家不一樣的風貌，這驅使歷史學家必須由“原理的世界”轉向“經驗的歷史”。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吸收了文化人類學的養分，從構成社會的儀式、話語、習慣和象徵等出發，批判將工人階級視為由工廠和蒸汽機等物質環境塑造出來的經濟決定論，揭示了英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在產業革命中對階級形成的作用。在E. P. 湯普森看來，階級是在經濟利害和文化自律的關係中產生的，工人階級鬥爭的主旨原本為改善福利、恢復對家庭的主導權。<sup>⑫</sup>E. P. 湯普森的研究開啟了對政治的文化詮釋，蘊含了70年代社會史研究的文化人類學轉向意義。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群星譜中，另一顆巨星是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霍布斯鮑姆通過對多種類型的農民造反進行的研究發現，“社會性土匪”(social bandit)即便能表現出更淳樸、更原初、更本真的道德覺悟，也永遠不可能走向革命。<sup>⑬</sup>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者、特別是從事中國研究的左翼學者的衝擊無異於“晴天霹靂”，學者們驀然發現以往的中國研究是想像和理念的混合物，由此出現了可稱之為社會史的轉向：“民眾”替代“階級”、“秩序”消解“鬥爭”。從1983年日本左翼史學的陣地《歷史學研究》可以看到堅持鬥爭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史興盛的反應。在第520期刊載的“社會史”專輯上，佐佐木潤之介批判社會史是“取悅人的歷史學”，批評關於“世相”、“風俗”等研究，認為應該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挖掘事實，重審歷史上人們的生活。<sup>⑭</sup>高橋昌明認為社會史旨在探究社會集團的特徵、民眾的生活和活動，可以將社會史和人民鬥爭史結合起來並將社會

史界定為人的實踐活動。<sup>44</sup>

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圍繞馬克思主義原理與經驗研究長期爭論不休。1988年，在紀念莫頓《英格蘭人民史》出版五十周年之際，莫頓的“人民”(the people)概念受到嚴厲批評。<sup>45</sup>19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衝擊是巨大的，霍布斯鮑姆《論歷史》(On History)一書記錄了其作為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1996年12月3日，霍布斯鮑姆在“我們能書寫十月革命的歷史嗎”的演講中，以斯大林所具有的“解放”與“暴君”身份為例說道：“歷史學家能不能對於這樣一個人以及這樣一種現象達成共識呢？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出有這樣的可能。就像法國大革命，(對)俄國十月革命將一直有不同的判斷。”<sup>46</sup>

### 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廣為人知的是屈威廉的“社會史”——“除去政治的民族史”(the history of a people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屈威廉的“a people”是“民族”、“國民”之意，既不同於佐野學的“人民”(Jin min)，也與莫頓所說的勞動者的“人民”(A People's History)相異，概指全體英國人，其歷史是社會史，為整個英國歷史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14~15日，倫敦大學舉辦了重新檢討“現在，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 Now)的研討會，紀念四十年前E. H.卡爾(E. H. Carr)的演講——《什麼是歷史》。當年卡爾的演講是有由頭的，即為了紀念屈維廉。<sup>47</sup>與會專家分門別類討論了社會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別史、帝國史等研究領域的現狀，最後將報告編輯為同名論文集。<sup>48</sup>英國學者談論社會史，自然繞不開屈維廉的命題。屈維廉出生在以治史著稱的家族，祖母是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妹妹，父親亦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自幼浸漬於史學的屈維廉，及長以史學為業，1927年成為劍橋大學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屈維廉治史偏向政治史和通史，但在其眾多的著作中，《英國社會史》知名度最高，這是因為書中的一句話——社會史是“除去政治的民族史”。對於這句話，在上述研討會上，研究古希臘史的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認為是“太奇怪的說法”，“謬誤的”，政治和政治性的東西在古希臘城邦中佔有支配地位。<sup>49</sup>筆者認為不能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屈威廉的話，因為文中不僅有“如果消極地界定的話，社會史是排除政治的民族史”；接著又有“大概任何民族，特別是從英國民族的歷史看，省略政治都是困難的。但是，因為很多歷史著作是由與社會狀況基本沒有關係的政治編年史構成的，採用這種相逆的方法，有助於(敘述的)平衡”。<sup>50</sup>也即，“排除政治”是一種敘述策略。對於研究政治史的屈威廉來說，在政治史和社會史之外，經濟史也很重要，政治事件與其產生的社會狀況大致一樣，而社會狀況是從經濟狀態中產生出來的。沒有社會史，經濟史會枯燥無味，政治史亦難被理解。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滿足於與政治史、經濟史的三足鼎立了呢？屈維廉認為：“社會史不是單純地給經濟史和政治史之間提供必要的聯繫，而是有其自身獨自的積極意義和獨特的領域的，其範圍可以說涵蓋過去國家居民的日常生活。”<sup>51</sup>《英國社會史》上起14世紀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時代，下至1901年的維多利亞時代，喬叟時代是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此後英格蘭才有了明確的國家。屈威廉認為，“無私無慾的知的好奇心是文明的真正的活力”，社會史則提供了一個了解文明活力所在的最好的視角。通過以往的記錄，人們知道祖先是無形、無色、無姿態、無熱情和有思想的；在日常行為中，有的盡臣僕之禮，有的出門投票，有的襲擊臨近莊園、誘拐少年，等等。在滿是美景的田野，有牛有馬，有持器具的農民，有終日在小屋裡忙碌的妻子，她們在等待丈夫傍晚歸來。無論貴賤，人們最平凡的生活被慣習、法律、複雜而不斷變化的政治機構以及國內外的事件所支配。政治與

其說是社會變化的原因，毋寧說是社會變化的結果。“歷史研究的準則是真實，而推動準則的動力是詩意，詩意正在於真實之中。”<sup>52</sup>社會變化緩慢，如黑死病造成的巨變很少見到，橫亙若干世代的工業革命不能作為劃分時代的標準，因此捕捉社會的漸進變化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見，屈威廉的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並列，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在社會與政治、經濟相互關聯中，若論關係的遠近，則社會離政治較遠，距經濟稍近，因為社會生活與經濟密不可分。恰如前文所論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況，經濟史是社會史的伴生物，談社會史必談經濟史，其思想源頭可溯及德國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

在英國，社會史與經濟史一向不分家，有一種說法稱，我們首先是歷史學家，其次必須是經濟史學家。在社會史這棵大樹上有很多枝蔓，各有淵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一是劍橋學人的人口史（historical demography），二是地方史（local history），三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劍橋學人的人口史和“地方史”代表了英國社會史的主流。劍橋學人的人口史研究追蹤社會史的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計量史學方法。20世紀60年代，從個人的教區生死登記簿入手的“家庭復原”（family reconstitution）方法給歷史人口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sup>53</sup>關於“地方史”——州郡、城市和教區的歷史——的研究，反映了“來自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聲音。在工業革命後，散處土地上的勞動者被召集起來送往工廠進行密集型勞動，與封建社會中的血緣與等級分界不一樣，人們生活的物理空間、人文空間的變化會影響到人與人的結合、人與社會關係的變化，由此出現了新的“社會”。<sup>54</sup>同樣，在20世紀60年代，“地方史”突破固執於聚焦傳統（村落自治體）而現代（工業化）的研究樣式，關注由人的思想和行動形成的各種關係的場域——“地方”。<sup>55</sup>

“年鑒學派”自始重視社會史與經濟史的關係。1929年《年鑒》雜誌創刊時名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經濟”和“社會”是兩個關鍵詞。戰爭時期“經濟”一度脫落，1938年改名為《社會史年鑒》（*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為應付書報檢查，繼而改為不定期《社會史論叢》（*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戰後（1946年），“經濟”重現，《年鑒》更名為《年鑒：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計量史學堪稱“年鑒學派”第二代所追求的科學方法的終點。此外，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早年和“年鑒學派”學人多有交往，在《年鑒》發表論文，通常也被算作廣義的“年鑒學派”學人。拉布魯斯融合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把對經濟結構的描述放在社會變動的框架下重新解讀，開創了“拉布魯斯學派”。拉布魯斯就任索邦大學社會史課程教授後，吸引了索邦大學一大半的博士課程學生湧入門下。相反，從費弗爾處繼承了反索邦大學風格的布羅代爾，在研究上一直與索邦大學存在競爭關係。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兩個分別研究地中海和舊制度（Ancien régime）危機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針鋒相對。拉布魯斯自信歷史的變動可以通過兩個結合——兩個循環（短期循環和長期循環）和時間性的兩個層次（結構和展望）來重構，經濟上的均衡和社會性的適應之間的緊張，研究領域的位置和大小，均可以測定並將因果關係模式化。布羅代爾則認為，歷史的過程有未被納入空間的不確定因素，應該抵制這種暗含決定論前提的純粹時間。<sup>56</sup>

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結合導致歷史學依賴經濟學所提供的理論模式，並不斷走向社會科學化，乃至歷史被視為可以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解剖的外在的客體。在科學導向的歷史學下，歷史主體處在休眠狀態，金茲堡（C. Ginzburg）嚴厲批評道：“自伽利略開始，自然科學的定量和反人類中心的方法使人文科學處於令人不快的兩難境地：要麼使用弱的科學標準，能夠獲得重要的結果；要麼使用強的科學標準，獲得不重要的結果。”<sup>57</sup>



#### 四、整體史

與把社會史視為一個領域相比，社會史最激動人心之處莫過於“整體史”(histoire totale)的訴求，這幾乎成了“年鑒學派”的代名詞。但是，若問什麼是整體史？包括當事人在內都沒有給出清晰的回答。<sup>53</sup>

嚴格地說，整體史不是指具體的歷史，而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除“年鑒學派”之外，明確表達整體史訴求的還有德國的“社會的歷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或曰“社會結構史”、霍布斯鮑姆宣稱的“社會的歷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整體史既然是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討論整體史必然涉及結構，結構與關聯性和既定性有關，是不可經驗的具有統一性的存在，“比勒菲爾德學派”(Bielefelder Schule)的科卡(Jürgen Kocka)將結構的特徵概括如下：(1)結構超越生活在時間中的同時代人的感覺，不會在屬於經驗範疇的事件的連續性中被消解；(2)如果敘述必須遵循時間先後順序的話，那結構就無法被敘述；(3)結構超越個體，無法還原於具體的個體；(4)結構先於事件；(5)即使不完全，由於關涉事件的內部，結構與事件是相契合的音符。<sup>54</sup>

“年鑒學派”是由三代學人不斷推陳出新而形成的。《年鑒》被稱為“新史學”(la nouvelle histoire)，“新史學”試圖在與“現在”的關係中重構“過去”，因此又被稱為“活著的歷史”(l'histoire vivante)。<sup>55</sup>“年鑒學派”第一代學人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理念，一個是問題史(histoire-problème)，另一個是跨學科方法。問題史是以當下的知識和認識為導向的研究。在近代學科體系形成之後，各學科各專業均有一套自以為是的規範，“問題史”要突破這些規範的掣肘，具體就是突破以蘭克史學為代表的現代史學。現代史學的實證方法面對的是既定的資料，不是基於問題意識而得來的；為了保證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現代史學把研究對象限定在資料來源可靠的政治和外交層面，這使得史學範圍變得很窄。1941年，費弗爾在給母校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演講中說：“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Pas de problèmes, pas d'histoire)；“歷史事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也是經由歷史學家喚醒的”。<sup>56</sup>前文引用的布洛赫未完成的遺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寫於1941~1943年戰爭下，英文書名取後半部譯為《歷史學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漢譯本大都因襲之。實際上，前半句是不能略去的，否則就無法理解布洛赫的寫作意圖。在參加抵抗運動期間，布洛赫心有所寄，試圖通過該書表達歷史學的功用：美的力量、知的力量、記錄的力量。

“年鑒學派”的另一個理念是跨學科方法。《年鑒》的兩位創辦人受社會學、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影響，從空間而非概念化的國家、集體切入歷史，發現了“地域”和“比較”方法。“地域”並非自然空間，是歷史學家問題意識的產物。1946年《年鑒》再出發後，費弗爾的“問題史”帶有明顯的法蘭西本位色彩。1957年費弗爾去世，布羅代爾繼任《年鑒》主編後，讓學術回歸本位，避免將個人的信念帶入歷史研究中，強化方法上的社會科學取向，與同時代拒絕社會科學方法的法國史學主流《歷史綜合雜誌》(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兩相對照。在“年鑒學派”的傳統裡，如果說布洛赫是“聖人”的話，布羅代爾就是“王者”。1949年初版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將歷史劃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來理解，是跨區域、跨國家的結構史的高峰。<sup>57</sup>“年鑒學派”給人以“整體史”的印象與布羅代爾這部巨著不無關係。1958年，布羅代爾在《年鑒》發表了堪稱整體史宣言的長篇論文——《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sup>58</sup>倡言研究景觀、生活樣式、心性結構等長期變化。《年鑒》雜誌開設的調查欄目、物質文明研究欄目，對展開大規模的經驗研究和新方法的探索不無助益；論者通過教區記錄、反映舊體制下的社會和資源特徵的人口統計學研究等，

在確立歷時性的計量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確立了將收集來的數據圖表作為研究經濟長期變動的方法。在布羅代爾關於地中海世界的巨著問世百年前，蘭克寫過關於地中海的歷史，關注的是西班牙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在該地區進行的拉鋸式博弈，論題限定在政治與外交領域。<sup>④</sup>比較而言，布羅代爾的研究無疑具有“全球視野”，但這部巨著輕視了歷史主體的存在，地中海世界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沒有進入作者的視野，這種整體史的“缺陷”反過來說明整體史乃是方法的產物。

以歷史人口學聞名的英國歷史學派——劍橋學人的研究具有結構史的訴求，堪稱另一種“整體史”。但是，正如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說，除了極少數左翼(left)外，“歷史的整體”(historical totalities)在英國鮮有人問津，與整體史有關的問題被分解到專門的研究領域。<sup>⑤</sup>主編《重思社會史》的威爾遜(Adrian Wilson)在檢討過往的社會史研究時指出，“作為整體史的社會史一直是一種渴望，不切實際的夢想。”<sup>⑥</sup>但是，不會定義馬的人，未必認不出馬。當把社會史視為切入歷史的方法時，作為意識內省的產物的社會史必然會產生對理論的訴求。霍布斯鮑姆試圖對社會史進行理論概括和提煉，撰寫了一篇討論整體史的論文。1970年，霍布斯鮑姆受邀在美國作《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演講，兩年後演講稿刊載在《代達羅斯》(Daedalus)上。<sup>⑦</sup>霍布斯鮑姆的論文是圍繞“社會史”(social history)和“社會的歷史”(history of society)展開的，他認為以往的社會史具有如下特徵：(1)窮人或下層階級的歷史，社會抗議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因此很容易和社會主義運動聯繫起來，從而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青睞。(2)從屈威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衍生出來的“剩餘的歷史”，將無法歸入政治史範疇內的很多內容放進社會史裡。(3)英國社會史的典型特點是與經濟史糾纏在一起，經濟學、社會學的優勢地位壓抑了社會史的學科主張。霍布斯鮑姆懷疑用社會學方法倒推歷史的可靠性以及經濟學對歷史的詮釋是否有效，主張建立屬於社會史的理論框架，即“社會的歷史”。他認為：(1)社會的歷史首先是歷史，在時間序列裡，社會如一個時間軸，由長線上不同的節點構成，社會的歷史關注歷史的結構和變化。(2)歷史是由各種各樣的群體構成的，是人與人結合的產物；不同結合構成了“社會”的基礎，因此對社會難以概而論之。(3)需要建立一個關於社會的敘述模式，處理結構性的問題。這有許多面向，例如人口、家庭、城市、階級及其團體、心態、社會轉型、社會運動與抗爭等。然而，這一“社會的歷史”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數據龐雜，歷史研究一方面要面對海量的數據與資料，另一方面真正可資利用的相當有限；二是過去不在場，觸摸過去有很大的難度，需要媒介；三是概念混亂，如果不對概念做清晰的梳理，描述的事物必然混亂。

霍布斯鮑姆所構建的“社會的歷史”蘊含了與英國馬克思主義“經驗史學”(empirical history)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意有所指地說：“現實對象的認識無須通過與‘具體’的直接接觸，而是通過這種對象(指認識對象)的概念的生產即理論可能性的絕對條件來實現的。”<sup>⑧</sup>這種“反歷史”的結構主義批判，對歷史學在科學和政治上的作用的否定，揭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史學之間的緊張，自然會引起包括E. P. 湯普森在內的反擊。E. P. 湯普森指斥阿爾都塞把真實還原為思想，混淆了真實和思想的關係，是一種“思辨的唯心主義”(speculative idealism)。<sup>⑨</sup>

德國(西德)社會史學者的關切與法英不同，而與日本近似，表現為反省德國為何在經濟上實現了現代化而在政治上卻未能。為此，學者們告別歷史主義(Historismus)——基於個性化原理，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獨特性、關注重要人物和事件、重視直覺、情感、理想等，轉而進行“社會史”(Sozialgeschichte)研究。孔茨(Werner Conze)的“結構史”堪稱一種整體史，它認為基於19世紀國家與社會二分而來的社會史，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密不可分的20世紀，應該轉而研究社會結構和經濟運動。1969年創辦的比勒菲爾德大學，是實踐另一種整體史的中心，先後到這裡工作的兩位學者起到了核心作

用,一個是生於 1939 年的韋勒(Hans-Ulrich Wehler),另一個是 1941 年出生的科卡。<sup>70</sup>他們在 1972 年編纂“批判歷史研究”叢書,1975 年創辦《歷史與社會》(*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雜誌,開啟了“比勒菲爾德學派”。不同於把社會史定位為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史,“比勒菲爾德學派”強調要將歷史學作為“歷史的科學”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的歷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在《社會史——概念·發展·問題》一書中,科卡特別強調“社會的歷史”要與原本出自法國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劃清界限,從理論上建構可以實踐“社會的歷史”的方法。科卡在檢討了五個必須滿足的條件後,感嘆即使是部分條件也難以實現,而且“社會的歷史”研究還須直面三個命題:唯物史觀、羅森伯格(H. Rosenberg)景氣的長期變化、現代化理論。如此一來,整體史就成為在社會科學方法驅動下的研究:“原則上所介紹的每一種理論都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在具體的歷史分析中通過其他要素和解釋模式來充實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可以作為理想型來使用。”<sup>71</sup>

## 五、主體的復歸

站在 1970 年代回顧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史學發展,有三種不同的“科學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模式、法國的生態—人口模式以及美國的群體計量方法。根據 1930 年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模式,歷史是在論題及其對立面的辯證過程中展開的,階級是圍繞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而產生和變化的,這種看法是歷史詮釋上的經濟社會決定論。1950 年代末以降,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 1930 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很多信條,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關心社會、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認為群體文化甚至個人意志都可能影響歷史的發展。如果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承襲了舊的認識模式,那麼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是新認識模式的踐行者。第二種“科學的歷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壯大的法國“年鑒學派”,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量化研究一枝獨秀,幾至有不能量化的歷史就稱不上科學的歷史之說。第三種“科學的歷史”是美國模式。美國的科學模式依靠團隊收集資料,將資料編碼和編程,最後通過計算機來推導結論。這種計量研究是運算的產物,無法用任何傳統的方法檢驗,其有效性在研究者內外都存有意見分歧。而為了消解歷史的不確定性,計量研究只能進行大規模的數量化研究,對一過性的現象則置之不問。

針對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所導致的“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完全相反的研究取向漸漸形成一股洪流,這就是 1960 年代嶄露頭角的人類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上的運用。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學者不是照搬人類學方法套解歷史,人類學的共時性研究與強調歷時性的歷史學根本不同,歷史學者是學習人類學觀察和研究對象的方法來重審歷史,這反過來也給人類學以刺激,催生了“歷史人類學”的誕生。通過向人類學學習,歷史學開始顧及以往被“科學”簡單化、勻質化的領域,事件史、政治史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涉及家族、死、性、犯罪、結合、宗教等自然與文化相關的邊緣領域的“心態史”,受到研究者廣泛的青睞,人們不再將價值體系、集體態度、集體無意識等視為自明的存在。1979 年,“年鑒學派”第三代學人布爾吉埃爾(André Burguière)在為紀念《年鑒》創刊 50 周年而撰寫的文章中,於稱讚費弗爾和布洛赫的先驅之功時,談到“問題史”方法,他頗有意味地說:“迴避過去,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合理的,不是通過先前示範價值的積累使我們與過去和解,相反,是為了與過去保持距離,使事件相對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們。”這段拗口的表述暗含了對“問題史”現在中心方法的修正。<sup>72</sup>

研究轉向的背後是呼喚主體復歸。1970 年代,德國歷史學者從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角度研究人口動態、家庭、風俗以及消費等被“社會的歷史”所忽視的領域,認為歷史與其說受結構性的要素制約,毋

寧說是日常生活中主體實踐的產物；批判“社會的歷史”中歷史主體不在，倡言要從日常史、自下而上的歷史中挖掘和弘揚主體的歷史。1984年，梅迪克(Hans Medick)批評“比勒菲爾德學派”的社會史，推崇以新社會史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去政治化，認為為此而需要導入日常生活史。<sup>③</sup>在這一新舊潮流交互下，1980年代中葉出現了“歷史的社會科學”(社會的歷史)和“日常史”之間的爭論。儘管如此，二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關聯的，如關於權力、權威及其與人的關係；關於生活環境的認識，生活環境原本屬於私領域，但其構成要素與政治的公領域無法切割。前文略述，在19世紀“文化”是鬥爭的概念，後來為“社會”所取代，“社會”成為歷史學的核心概念而與政治、國家對峙。1993年，丹尼爾(Ute Daniel)回顧了社會史研究中“社會”與“文化”關係的變化，認為社會史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1960年代，社會學和歷史社會科學的“社會”概念是中心，文化被社會經濟制約；20世紀末，文化取代社會的優先性，居於研究的中心，被視為具有主體意義的認識形式。<sup>④</sup>

與法德歷史學的變化幾乎同步，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社會史的文化轉向或曰呼喚主體復歸的趨勢。網野善彥的《蒙古襲來》(1974)、《無緣·公界·樂》(1978)是日本史研究的範本；阿部謹也的《花衣魔笛手》(1974)是研究外國史的樣本。1982年10月，不同研究方向和專業的學者，以阿部謹也(德國史)、川田順造(文化人類學)、二宮宏之(法國史)和良知力(社會思想史)等為召集人創辦了《社會史研究》。這本低調的同人雜誌沒有宣言，只持續到1988年第8期。要了解這本學術雜誌的主旨，必須通過閱讀收錄其中的論文才能獲得。無論是阿部<sup>⑤</sup>，還是二宮<sup>⑥</sup>，《社會史研究》的同人均把視角集中在人及其結合體上，而將近代以來推動強制勻質化的國家和政治置於一旁。1990年代初，二宮宏之撰文指出，社會史研究的是邊緣狀態，當下的社會史已經大不同於從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三個層面：(1)從尋找客觀性轉向對文本的解讀，因為歷史是通過文本呈現和傳遞出來的，與其尋找文本之外不可尋的客觀性，不如回到文本中挖掘文本化的事實；(2)從普遍性轉向地方性，即對普遍知識的追求轉為對地方知識的探討；(3)擺脫了方法論上的西方中心。

人重新成為歷史敘述的中心意味著歷史書寫樣式的變化。1979年，斯通(Lawrence Stone)批判《年鑑》把事件視為偶發的短時段，強調敘事是自塔西佗以來的傳統，著名史家吉本、麥考萊皆以敘事著稱。他對敘事與結構史作了如下區隔：(1)結構史是分析性的，敘事是描述性的；(2)結構史關注情境，敘事關心的是人；(3)敘事涉及特殊和具體，而結構史關乎集體和一般。敘事不是一般意義的紀實和古籍整理，而是遵循“懷孕規則”——有主題有論點。修昔底德的主題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及其對希臘社會的災難性影響；吉本的主題是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麥考萊的主題是在革命政治壓力下自由參與式憲法的出現。傳記作家講述生命從生到死的故事，敘事史學家並不完全規避分析，他們對修辭十分講究。<sup>⑦</sup>

基於對主體情感和思想的關切，早在心態史復興之時，意大利就傳出了不和諧的聲音。1970年，文圖里(Franco Venturi)批評心態史的想法過於簡單，忽視了主體的創造力。1976年，金茲堡擴大批判範圍，認為心態史過分強調世界觀中不動的、黑暗的和無意識的因素，低估了理性地和有意識地表達思想的重要性。由於不合理地把所有社會環境都置於相同的範疇和觀念中，並對思想的內容加以簡化，這就忽略了非同尋常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心態史將社會全體視為同質，人的思考和情感受到心態結構的支配。<sup>⑧</sup>

這樣，另一個關涉主體的領域——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呼之欲出。在記憶研究看來，“問題史”的現在中心方法即使是“科學的”，也忽視了無法喚醒的死者的情感和思想。在此，幾乎被人淡忘的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理論獲得高度關注。圍繞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係，

布洛赫與哈布瓦赫兩個同僚之間曾有一段文字唱酬。布洛赫認為,即便記憶是集體的,也無法將記憶主體歸於集體這一實體之中,而且一旦將集體這一形容詞視為如個體一樣可以“回憶”的,則會陷入將集體視為自明的實體的危險。<sup>⑩</sup>哈布瓦赫回應道:“歷史既不是過去的全部,甚至也不是過去的遺留物。在被書寫的歷史之外,還有活著的歷史,通過時間它使自身得以持續和更新,並且使得人們得以發現浮出表面的許多過去的遺留物。”<sup>⑪</sup>1980代中期,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巨著《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問世<sup>⑫</sup>,這一研究既接續了哈布瓦赫開闢的集體記憶研究,又可視為“年鑒運動”中的一環,它凸顯了歷史與表象、實在的世界(社會史)與表象的世界(新文化史)的裂痕,把哈布瓦赫視為時空上存在的結合體——集體,改為由超越時空的象徵媒介來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體。<sup>⑬</sup>涵蓋口述史、公共史學等領域的記憶研究,在不斷進行的自他詰難中,必須時刻面對何謂主體的質疑:是說記憶,還是記憶在說。

## 六、新社會史

“一切皆成碎片,一切皆無關聯”(Tis all in pieces, all coherence gone)。<sup>⑭</sup>17世紀英國詩人多恩(John Donne)的詩句形象地概括了社會史/新社會史對美國“進步派”歷史所造成的衝擊。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三人合著的《歷史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將社會史的盛行視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產物。<sup>⑮</sup>

翻開美國社會史的履歷簿,不管社會史的內容怎樣令人眼花繚亂,自始不離對人群的關注。<sup>⑯</sup>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史,又稱新史學、新社會史,本文統稱為新社會史。新社會史的譜系可以溯及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比爾德(Charles A. Beard)。<sup>⑰</sup>1912年出版的魯賓遜《新史學》將新史學的旨趣定位為:糾正偏向政治史的敘事、深化科學的方法和基於當下問題意識的研究。<sup>⑱</sup>1913年,比爾德破除由建國元勳構建的國家敘事,把美國憲法與《獨立宣言》一分為二,斥責“憲法”為反動,反轉了美國歷史的敘事。1930年代,米勒(Perry Miller)把殖民時代的歷史與其後的美國歷史切斷,考察清教徒在思想和意識的驅動下如何創造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美國的歷史,開創了美國史敘述的典範。<sup>⑲</sup>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米勒的研究方法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的追問方式:為什麼美國既不同於極權主義國家也有別於法西斯國家?答案無疑在美國歷史未曾揭示的脈絡中,這是新社會史興起的源頭。新社會史興起的直接動力來自1960年代公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新左派史學”的歷史批判。

1967年,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斯蒂恩斯(Peter Stearns)創辦《社會史雜誌》(*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聚焦普通人(ordinary people),從社會形成的過程中詮釋美國歷史。“新社會史”關注邊緣性和差異性,研究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不再是政治制度而是權力關係、不再是思想而是人們的意識。雖然一些新社會史的倡導者強調社會史研究的是歷史,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重構整體的歷史<sup>⑳</sup>,但新社會史帶來的“碎片”效應還是激起了一場討論。

對新社會史發難的一位學者是希梅爾法(Gertrude Himmelfarb)。這位研究英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在1984年4月《哈珀》(*Harper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排除政治的歷史》(*History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的文章,對社會史、新社會史展開了批判。希梅爾法在文章題頭引用了斯蒂恩斯寫於1976年的一句頗帶挑釁的話——“當月經初潮的歷史被廣泛認為與君主制的歷史同等重要時,我們就達到(目的)了”。在希梅爾法看來,當下的新史學=新社會史不過是步入中年的魯賓遜和比爾德新史學的翻版,包含了各種互相排斥的主題和方法。新史學往往“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是主題性的而非編年性的”,更依賴於統計表、口頭訪談、社會學模型和精神分析理論,而不是憲法、條約、議

會辯論、政治著作或政黨宣言等。舊史學通常關注政權和行政、立法和政治、外交和外交政策、戰爭和革命，而新史學則關注階級和族群、社會問題和機構、城市和社區、工作和娛樂、家庭和性、出生和死亡、童年和老年、犯罪和精神錯亂。舊史學以國王、總統、政治家、領袖、政治理論家為主題，而新史學以“無名群眾”為對象。舊史學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所謂“精英主義的歷史”，新史學則推崇“自下而上”的“民粹主義的歷史”。<sup>⑩</sup>希梅爾法刻薄地說：社會史學家拒絕接受任何像美好生活這樣的“精英主義”想法，只尋求理解生活，探究生活的無意識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方方面面，否認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獨一無二的動物——理性動物。”<sup>⑪</sup>希梅爾法這篇文章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批評，有人指責她蔑視社會史。三年後，希梅爾法在將這篇文章收入文集時追加了一篇後記，辯稱自己在文章中不下七次說反對的不是社會史本身，而是它的主導性、優越性；反對的不是社會史對傳統史學的補充，而是社會史試圖替代傳統史學。”<sup>⑫</sup>

全球史和跨民族史學者本德(Thomas Bender)在表示贊成新社會史的文化多元主義訴求後，批評其研究過於細化所帶來的碎片化，強調歷史研究應該有“綜合”(synthesis)，特別是“國家的綜合”(national synthesis)。在此本德對國家(nation)給予了全新的解釋，國家“是為了獲得界定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權力而在不同社會組織和思想之間持續博弈的偶然性的產物”。<sup>⑬</sup>國家圍繞公共文化博弈而不斷變化，而公共文化含蘊了諸種社會力量，公共文化這一術語的導入擴展了“政治”的含義，打通了在社會史研究中政治與社會二分的格局：“舊”的新史學在追求美國精神(文明)的同時，也要關注美國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新社會史須直面其所批判的政治史，追求一種新的政治的、國家的綜合。本德認為必須把美國的國家(nation)形成置於全球史視野下進行研究<sup>⑭</sup>，這可視為從內在在於美國歷史中的“全球史”與由此成長出來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去重新界定國家，這樣，所謂多元與一元的視角就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包含的。

對於本德將新社會史所體現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價值融合在一起的努力，研究城市史的孟考寧(Eric H. Monkkonen)撰文指出，由大眾媒體(public media)製作出來的“歷史綜合”無視歷史研究的成果，所謂社會史造成歷史碎片化的說法實則是公共媒體製造出來的；“綜合”看起來很美，是因為其缺乏透明性。他認為新社會史應該秉持這樣的信念：只有在“碎片化”的各個子領域，才能看到專業的、以研究為導向的綜合，這些綜合將產生更多的理念，但不會創造出一種“整個過去”的感覺。<sup>⑮</sup>1987年，《美國歷史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6月號組織了一場圓桌會議——“美國歷史上的綜合”筆談。以研究種族和性別著稱的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撰寫了《歷史上的偏見與綜合》(*Bias and Synthesis in History*)，指出我們需要連貫而全面的歷史，需要整個社區的歷史，包括民族國家的歷史。但是，本德卻忽略了當初到底是什麼讓歷史綜合變成“不可靠的歷史綜合”(discredited historical synthesis)——無視性別、黑人的遭遇以及對同情二者所予以的偏見，歷史上剝奪女性和少數族群權利的“公共文化”意味著白人男子權利的強化。佩因特認為如果必須選擇某種綜合的話，首先就要承認少數族群和女性在公共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還要容納非裔美國人的音樂(因為它在黑人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美國流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及在家庭中數百萬婦女的勞作。<sup>⑯</sup>其他幾位筆談者相對比較溫和，認為本德展示了一個碎片化後進行整合的方向，但所謂“公共文化”究竟能涵蓋多少邊緣的、非政治的聲音，對這一共同的關心並沒有達成共識。在上述“圓桌會議”最後，本德對各位學者的意見作了簡單回應，正如其文章副標題所表明的，這是一個有待繼續的對話(continuing dialogue)。<sup>⑰</sup>

## 七、後社會史

1980年代末,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接近尾聲。1994年,《年鑒》雜誌改名為《年鑒——歷史、社會科學》(*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年鑒》每次改名都有特定的寓意,“社會”二字從未脫落。“社會”從《年鑒》的脫落是歷史學在經歷“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或“批評性的轉向”(un tournant critique)衝擊之後的結果。

在《年鑒》創刊之初,“社會”原本只是修辭。前文提到1941年費弗爾在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演講,其中談到《年鑒》創辦時選擇“社會”的理由,他說:“沒有經濟和社會史。只有統一的完整的歷史。從定義上講,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sup>98</sup>1988年《年鑒》第43卷第2期卷首語題為《歷史與社會科學:批評性的轉向》(*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預示一場深刻的社會史危機的到來。<sup>99</sup>1989年《年鑒》第6期刊發了兩篇重要論文,一篇是諾瓦里埃爾(Gérard Noiriel)的《朝向社會的主觀主義方法》(*Pour une approche subjectiviste du social*),一篇是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作為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諾瓦里埃爾顛覆了人們關於涂爾幹社會學影響了“年鑒學派”的說法,指出“年鑒學派”倡導的跨學科不過是“一個必要的神話”(un mythe nécessaire),歷史學者應該從“主觀主義範式”(paradigme subjectiviste)重新思考社會,超越費弗爾而向狄爾泰(Wilhelm Dilthey)、馬克斯·韋伯學習。<sup>100</sup>夏蒂埃認為歷史學的危機是整個社會科學——以結構主義為特徵的社會科學整體論的解釋體系的危機中一部分,從此世界被視為文字、影像、聲音等表象的場域,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實際上是表象的世界,應該從人和人結合的方式重新思考社會。<sup>101</sup>論者對社會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動搖了社會史由以存在的基礎,1990年喬伊斯(Patrick Joyce)感嘆,面對後現代主義的衝擊,馬克斯的幽靈將左右兩極的人士糾結起來共同應對。對於混戰的結果,他認為“社會話語史”將成為社會史必須直面的新課題:如果社會歸根結底是一種話語建構的話,那麼只有研究話語建構的原理,歷史學才能有所發展。<sup>102</sup>

沒有時間就沒有歷史,只有將文本置於特定的語境進行時序排列之後解釋才有可能。從古希臘轉向現代希臘研究的蓋倫特(Thomas W. Gallant)認為,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等姊妹學科對時間的看法不同,“政治史和經濟史適合於連續的敘事分析,像一部電影,講述一個個連貫的故事:事件可以被綴成連續的序列,把捉上一個情節與下一個情節的時間關係。社會史則遵循不同的時間順序,在歷史記錄中,社會變革與其說是作為事件出現的,不如說是作為過程出現的,因此,很難將其作為離散的時間點來劃分;社會史的資料來源也不太適合按時序分析,過去的社會記錄是零散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空白,尤其是社會中最大的群體——農民和工人——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留下關於自己生活的書面記錄。由於這些原因,社會史不像一部電影,而更像一系列在不同時間點拍攝的快照。”從蓋倫特所描述的角度看,布羅代爾關於歷史時間的三段論顯得脫離了社會史研究的實際。<sup>103</sup>朗西曼(W. G. Runciman)的《社會理論論集》(*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提供了認識社會史框架的新角度。在這部超過千頁的三卷本著作中,朗西曼創造了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的名詞——“系統”,用以指稱歷史上的行動者所身處的“社會”。朗西曼認為行動者所承擔的“角色”處在三維的空間中,其軸線與三種權力模式相對應,分別為: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政治—強制模式。依此,社會可以被定義為許多權力網絡,角色為獲得或控制生產、說服和強制對手而彼此競爭。社會進化類似於自然選擇,但不能被還原。朗西曼野心勃勃地創出社會理論,試圖解釋多樣性的來源和決定其演化的制約因素,在上述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和政治(強制模式)三個層面分別有8、8、7個變體,

原則上可以推衍出 450 種“社會”。<sup>⑩</sup>這似乎解釋了社會史歷經百年發展後“社會”脫落的原因所在：社會是人為的和流動的。

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沒有生路了呢？否。雖然筆者認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已經落幕，但社會史的理念不僅滲透到歷史學中，還波及其他學科，名為“某某社會史”的流行便是明證；更為重要的是正處在“泡沫”階段的新文化史呈現出不可持續的熱度，它與社會史之間的界限並非那麼清晰，原本屬於社會史研究者的 E. P. 湯普森、夏蒂埃也出現在新文化史的群星譜中。伯克 (Peter Burke) 在《什麼是文化史》(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 中稱社會史開始了“反擊”( *revenge* )，社會的文化史和文化的社會史彼此存在交叉關係。在 2008 年該書的修訂版中，伯克提到更“新”的新史學主張，稱其是輪廓略顯“含糊”( *obscure* ) 的“後社會史”( *postsocial history* )。<sup>⑪</sup>伯克所說的“後社會史”指的是西班牙學者卡夫雷拉 (Miguel Cabrera) 的《後社會史初探》(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sup>⑫</sup>

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初探》是一本討論現代性危機下如何打破主客二分、以“後社會史”來超越“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著作。在緒論中，他直言：“在社會史研究中，為使社會結構和主觀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更加靈活、複雜和偶然而做出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人們不僅懷疑這種因果關係是否存在，甚而懷疑涉及的其中兩個實例。”<sup>⑬</sup>“現代性危機註定會引發既有史學方法範式的瓦解，並帶動社會史學和傳統史學的分析性概念都趨於去自然化。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促使人們意識到，這些概念，以及它們所支撐的有關社會的那些理論，並非世紀存在的社會現象或過程的單純表徵或標籤，而是一些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形式，是使社會成為某種可以理解或蘊含意義的東西。歷史學家之所以渾然不覺，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是現代概念世界的基本組成部分，就在這個世界中工作。因此，現代性危機引發了某種概念祛魅，理論的單純無瑕趨於失落，並且似乎不可逆轉。”<sup>⑭</sup>要拯救社會史、超越新文化史，卡夫雷拉開出的藥方是“概念祛魅”( *conceptual disenchantment* )。他注意到英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和德國的“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 )，卡夫雷拉也將“後社會史”稱為“話語史”( *discursive history* )，由此來看，他似乎對三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還沒有確定的認知。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與話語史相近，而與德國概念史相距甚遠，至少當事人雙方均持這樣的看法。而根據上述“概念祛魅”的訴求，可以說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與概念史更為接近。

但是，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雷克對概念史的看法與卡夫雷拉不盡相同。在德國社會史研究的重鎮比勒菲爾德大學任教的科塞雷克，似乎認同同僚的結構的社會史，不過由於導入概念史的視角，他對社會史的詮釋蘊含了卡夫雷拉所說的“後社會史”的特徵。科塞雷克《概念史與社會史》(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 一文認為，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語言和結構，社會史研究文本背後的情景。概念史的重要性在於，“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會有共同的社會，特別是不會有行動的政治領域”。概念植根於政治—社會制度中，這些制度比圍繞某些特定關鍵概念組織起來的語言共同體更要複雜。概念史是作為社會史的一種研究方法出現的，有助於強化社會史所討論的問題的確實性。在解讀文本時，首先要找出其中的核心概念，進而了解句法和詞語在文本中的位置；其次要考慮作者、讀者、語言共同體、社會結構；最後要意識到新詞語即政治方案對未來的期待。作為方法，概念史服務於社會史；作為領域，概念史是擁有自己方法的獨立學科。概念史的方法論要求有一個自主的領域，這存在於它與社會史相生相剋的緊張關係中。概念史批評將現代語境的概念草率地移植到過去，概念就像生命體一樣，其本身構成了歷史：“既是歷史轉折的標誌，又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概念史通過共時分析和歷時分析之間的轉換，揭示過去經驗的持續性和過去理論的可行性。<sup>⑮</sup>

1990 年，于特 (Robert Jütte) 的《現代語言學與“新史學”》( *Moderne Linguistik und “Nouvelle His-*



toire”)觸及新史學——社會史與概念史之關係。于特認為,歷史語義學可以區分出兩個主要方向:一個是從事概念史的研究者,他們對意義的質變及其歷史意義感興趣;另一個是歷史研究者,他們用定量方法研究語義差異和語言變化,早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新史學已經展現出以質性研究為導向的歷史語義學方法。<sup>⑩</sup>前文提及《重思社會史》的主編威爾遜,他在文章中認為,社會史中的“語言學的轉向”涉及三個方面內容:(1)對語言範疇(詞匯)、網格(不同能指間的差異關係)和系統(話語)的效力的關注,(2)把過去的語言本身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3)對歷史學家的修辭結構的認識。在這三個方面中,第一個最為重要,也是最成問題的,因為它在社會史範式方面有著模糊的意義:一方面,它只是將該範式擴展到一個新的理論領域,利用從語言學理論中提取的資源,就像上一代人使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工具一樣。然而,另一方面,它的效果是破壞了傳統上作為社會史特徵的一些範疇及其解釋。這種修正主義尤其集中體現在社會階級概念上——特別是在提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時,它對作為社會經濟現實的階級身份和作為政治忠誠或“意識形態”的階級利益都提出了質疑。<sup>⑪</sup>

與于特和威爾遜的看法可以進行比較的是卡夫雷拉,後者沿襲了科塞雷克的說法,認為概念的歷史形式本身不僅是研究的課題,更重要的是還構成了社會理論的基礎。後社會史既不像傳統史學假設個體是自主的主體,也質疑社會史將社會視為客體的實在而能從因果關係上予以詮釋。於此,舊有的二元理論圖示(實在/觀念)被拋棄,替之以三元理論圖示(實在/語言/觀念),語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定領域。“在新文化史看來,語言依然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對於客觀意義的表達手段,即使是符號性的手段。因此,語言中介的效果,無非是讓個體相對於社會背景的強制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與此相反,在後社會史看來,語言是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時生成客體性和主體性,並重新安排著兩者之間結成的關係。”<sup>⑫</sup>在此,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直指概念史。在筆者看來,概念史就是一種後社會史,它使得在“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流離失所、“碎片化”的社會史有了新的棲身之所。

## 結 語

如欲勾勒百年來社會史研究的內在理路,其難度絕不亞於撰寫一部通史,因為後者不管在體系上多麼殘缺不堪,總有人們可以認可的閱讀規範來支撐。而對社會史的理解,則因人而異。借用前文引用的蓋倫特的比喻,本文的考察不像一以貫之的電視連續劇,更似一個觀光客隨手記錄的快照,而將快照連綴起來呈現出的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也僅僅是不同詮釋中的一個角度(perspective)的產物。

從全球範圍看,社會史的出現和展開是全球史學思想“共振”和“連動”的產物。所謂“共振”,指呼應民族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是全球普遍可見的現象。現代史學將不能證實的文字、口傳和圖像資料從敘述中剔除出去,並將研究對象鎖定在“透明”的政治層面。對於這種被稱為“蘭克史學”的現代史學,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不斷有來自文化史和(國民)經濟史方面的質疑。如果沒有德國的《經濟社會史季刊》的觸發,很難想像會有法國《年鑒》的誕生,二者之間無疑存在思想上的“連動”。《年鑒》確立的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的意識規定了社會史的發展方向,而其不斷推出的卓有見解的著作創出了 20 世紀歷史學的“年鑒範式”。

提到社會史,論者均溯及 1929 年誕生的《年鑒》,忽略了日本社會史的存在。現代史學誕生不久即已傳入日本,在蘭克的弟子里斯(Ludwig Riess)的指導下,《史學雜誌》開始踐行現代史學的研究方法。從日本現代史學破殼而出的社會史有兩個思想源頭,一個是經濟史,另一個是民俗學。日本的社會史研究不僅出現時間早,而且幾乎觸及後來社會史研究中的所有命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圈外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論者一般將目光集中在英國，其實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早熟於英國，而且有其自身的特點；與文化主義傾向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不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拒絕那種消解了階級和鬥爭的社會史，其理論與實際之間長期存在緊張。

回顧 1980 年代以前的社會史，不必說“整體史”，即使是“被埋沒的人民史”和“除去政治的民族史”等，其暗默的前提仍是“整體史”，這與將社會史的“社會”視為實在的認識對象不無關係。作為反動，無論是歐洲“文化人類學”取向下的“主體的復歸”，還是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取向下的“新社會史”，1980 年代後的社會史呈現出“後現代”狀況——去中心化，歷史學如“面包屑”一樣被細分了。<sup>①</sup>

社會史如何才能自我救贖？可以開出一個藥方是，接續社會史基因中的批判性格，進而展開對“日常性”的批判。以往社會史倡言回到日常，旨在去除結構的、非日常的歷史敘事，但日常與非日常往往是一種構和關係，由於日常的“惰性”是由歷史和文化所支撐的，社會史有必要與其進行二義性的博弈。“微觀史”(microhistory)展示了頗具建設性的方向。微觀史的“微”並非“小”之意，而是“小即多”(Less is more)，從小處入手通向大處——世界史或全球史。<sup>②</sup>

在社會史的百貨店裡，社會史與傳統史學(政治史)、社會史(實在的社會)與新社會史(話語的社會)，均存在不可逾越的溝壑，對此論者開出了不同的處方。美國全球史學者本德提出以涵容諸種權力關係的“公共文化”來整合歷史的碎片，儘管還存在何謂公共文化、誰來保證公共文化的“公共性”的爭議，但不失為一個可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對於後者，西班牙學者卡夫雷拉直言社會史不會被新文化史的波濤淹沒，它具有強調表象的新文化史所無法替代的追求實在性的長處，如何消解主客體二分的研究狀態，卡夫雷拉倡言的“後社會史”裡原來端坐著概念史。

①本刊評論員：《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北京：《歷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②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73. 格奧爾格·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趙世瑜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年，第 191 頁。

③太田秀通：《世界史認識の思想と方法》，東京：青木書店，1978 年，第 20~21 頁。

④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5.

⑤リュセット・ヴァランシ「第Ⅱ卷序文——パラダイム転換と一つの歴史學派の形成、1946—1957 年」、E. ル＝ロワ＝ラデュリ，A. ビュルギエール監修、浜名優美監訳『アナル1929—2010』、歴史の対象と方法 2、東京：藤原書店、2010 年、第 15 頁。“監修人”E. ル＝ロワ＝ラデュリ即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A. ビュルギエール即安德雷·布爾吉埃爾

(André Burguière)，本書為日本讀者所編，共五卷，精選了《年鑒》八十年間反映各個時期特徵的論文。

⑥《致讀者》的內容有四點：第一，感謝法國和外國合作者的幫助。第二，破除關心過去與現在的歷史學家擦肩而過的現象。第三，破除古代史學家、中世紀史學家和“現代化”史家各說各話現象，打消“文明”與“原始”的區隔。第四，破除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Marc Bloch, Lucien Febvre, “À nos lecteur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sup>e</sup> année, n° 1 (1929), pp. 1-2.

⑦Samuel Kinsler, “Annaliste Paradigm? 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6, no. 1 (1981), pp. 63-105.

⑧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黃豔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3 頁。

⑨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5.

⑩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

2014》,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7頁。

⑪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 11-15.

⑫呂西安·費弗爾:《萊茵河》,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⑬Jan Burzlaff, "Avis de recherches: Les Annales entre France et Allemagne," *Vingt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 135 (2017), pp. 185-186.

⑭⑲⑳㉑佐野學:《日本社會史序論》,東京:同人社書店,1922年,第1頁;第1~2頁;第3頁;第4頁。

⑮本庄榮治郎:《日本社會史》,東京:改造社,1924年。

⑯本庄榮治郎:《日本社會史に就いて》,《歷史と地理》,第12卷第5號(1923年)。

⑰喜田貞吉:《日本社會史とは何ぞや》,《歷史と地理》,第13卷第2號(1924年);《喜田貞吉著作集10 部落問題と社會史》,東京:平凡社,1982年。

⑱滝川政次郎:《日本社會史》,東京:刀江書院,1929年。

⑲飯田泰三:《ナショナル・デモクラットと<社會の発見>》,同《批判精神の航跡——近代日本精神史の一稜線》,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

⑳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 in Peter N. Stearns (ed.), *Expanding the Past: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㉑Hans-Ulrich Wehler, *Geschichte als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S. 12.

㉒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 Probleme*,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7, S. 60.

㉓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 275.

㉔關於《年鑒》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費羅(Marc Ferro)在接受採訪時否認二者之間有聯繫。フランドロワ編、尾河直哉訳:《「アナール」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第61~64頁。本書是應藤原書店的邀約,由伊莎貝拉·弗朗德瓦絲(Isabelle

Flandrois)編輯的對“年鑒學派”重要學者的採訪錄,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人事糾結。

㉕Lynn Hunt,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 1.

㉖參見:佐野學:《無資產階級解放の道》(一),《デモクラシイ》第1卷第1號,1919年3月6日;片島新:《マルクスかカントか》(一),《プレスコウスカヤ女史》,第1卷第4號(1919年6月1日);片島新:《マルクスかカントか》(二),《クロポトキンの社會思想》(一),《デモクラシイ》,第1卷第5號(1919年7月1日)。

㉗佐野學:《特殊部落民解放論》,《解放》,1921年7月號。

㉘石川六郎編輯:《過激派》(新時代叢書),東京:民友社,1919年。

㉙佐野學:《唯物史觀批判》,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8年。

㉚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в СССР за 10 лет,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8, № 2 (26), сс. 3-30.

㉛新華社:《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北平:《人民日報》,1949年8月15日。

㉜石母田正:《中世的世界の形成》,東京:伊藤書店,1946年;《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卷)《中世的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

㉝山本幸司:《社會史の成果と課題》,《岩波講座・日本の歴史》第22卷,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

㉞戸邊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岩波講座・日本の歴史》第22卷,第140~141頁。

㉟網野善彦:《無縁・公界・樂》,收入《網野善彦著作集》第12卷,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

㊱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第221~232頁。

㊲Arthur Leslie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8.

㊳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 P.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

㊴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sup>th</sup> and 20<sup>th</sup> Centur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Eric Hobsbawm, *Bandit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 ④③ 佐々木潤之介:《「社会史」と社会史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520号(1983年9月)。
- ④④ 高橋昌明:《社会史の位置と意義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520号(1983年9月)。
- ④⑤ Patrick Curry, “Toward a Post—Marxist Social History: Thompson, Clark and Beyond,” in Adrian Wilson (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 157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1.
- ④⑥ 霍布斯鮑姆:《論歷史》,黃煜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73頁。
- ④⑦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anuary—March 1961.
- ④⑧ David Ca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④⑨ Paul Cartledge, “What is Social History Now?” in David Ca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p. 20.
- ⑤①⑤② 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6, p. vii, p. vii, p. x.
- ⑤③ Michael W. Flinn, *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 1500-182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⑤④ W. G. Hoskins, *Local History in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1959; 霍斯金斯:《英格蘭景觀的形成》,梅雪芹、劉夢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⑤⑤ H. P. R. Finber, V. H. T. Skipp, *Local History: Object and Pursuit*,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67.
- ⑤⑥ アンドレ・ビュルギエール:《第Ⅲ卷序文——ブローデルの時代、1958—1968年》、E.ル=ロワ=ラデュリ, A.ビュルギエール監修、浜名優美監訳:《アナーナル1929—2010》,歴史の対象と方法,東京:藤原書店,2010年,第16頁。
- ⑤⑦ Carlo Ginzburg, “Roots of a Scientific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vol.7, no. 3 (1979), p. 276.
- ⑤⑧ Lucien Febvre,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 S. E. V. P. E. N., 1962; Theodore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no. 2 (1976), pp. 237-245; 竹岡敬温、川北稔編:《社会史への途》,東京:有斐閣,1995年,第120~122頁。
- ⑤⑨ 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 Probleme*, S.73-74.
- ⑥⑩ Ignacio Olah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1 (1995), pp. 4-5.
- ⑥⑪ 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 *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n° 3 (1943), pp. 8-9; 呂西安·費弗爾:《為歷史而戰》,高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2年,第24~25頁。
- ⑥⑫ 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唐家龍、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 ⑥⑬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sup>e</sup> année, n° 4 (1958), pp. 725-753.
- ⑥⑭ Leopold von Ranke, *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Duncker und Humblot, 1877.
- ⑥⑮ Gareth Stedman Jones, “History: The Poverty of Empiricism,”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110.
- ⑥⑯ Adrian Wilson, “A Critical Portrait of Social History,” in Adrian Wilson(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 175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p. 21.
- ⑥⑰ Eric. J.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vol.100, no.1 (Winter, 1971), pp. 20-45; 霍布斯鮑姆:《論歷史》,第109~141頁。
- ⑥⑱ Louis Pierre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p. 184; 路易·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慶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07~208頁。
- ⑥⑲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London: Merlin Press, p. 29.
- ⑦⑩ 1923年出生的科塞雷克在1973至1974年受聘該校,聘期結束後正式任教於該校,直至1988年退休。

- ① 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 Probleme*, S. 100-107.
- ② André Burguière, "Histoire d'une histoire: La naissance des Annal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4<sup>e</sup> Année, n° 6 (1979), p. 1355.
- ③ Hans Medick, "Missonare im Ruderboot? Ethnologische Erkenntnisweis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Sozial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Bd. 10, H. 3 (1984), S. 295-319.
- ④ Ute Daniel,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Überlegungen zum Gegenstandsbereich der Sozial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Bd. 19, H. 1 (1993), S. 69-99.
- ⑤ 阿部謹也:《ヨ一口ッパ・原点への旅——時間・空間・モノ——》,《社会史研究》,創刊號(1982年10月)。
- ⑥ 二宮宏之:《参照系としてのからだところ》,《社会史研究》,第8號(1988年3月)。
- ⑦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85 (Nov. 1979), pp. 3-24.
- ⑧ Roger Chartier, "New Cultural Histroy," Joachim Eibach und Günther Lottes (HG.), *Kompas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 Handbuch*, Göttingen 2002, S. 196.
- ⑨ Marc Bloch,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tome 40, Paris: La Naissance du Livre, 1925, pp. 73-83.
- ⑩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Colophon Books, 1980, pp. 64-65.
- ⑪ 參見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豔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筆者主持的中文全譯本15卷將陸續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⑫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München: C. H. Beck, 1999, S. 132-133.
- ⑬ Robin Robbins, ed.,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 Donne*, London: Pearson Educated Limited, 2008, p. 838.
- ⑭ 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第140頁。
- ⑮ Peter H.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 ⑯ Thomas Bender, "The New History: Then and Now,"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2, no. 4 (December 1984), p. 612.
- ⑰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 ⑱ 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第120~128頁。
- ⑲ Peter H. Stearns,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no. 2 (1976), p. 252.
- ⑳㉑㉒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 pp. 25-26, p. 26.
- ㉓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1 (June 1986), p. 126.
- ㉔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pp. viiii, 296.
- ㉕ Eric H. Monkkonen, "The Dangers of Synthe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December 1986), p. 1156.
- ㉖ Nell Irvin Painter, "Bias and Synthesis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 1 (June 1987), pp. 109-112.
- ㉗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 1 (June 1987), pp. 123-130.
- ㉘ 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 p. 6. 呂西安·費弗爾:《為歷史而戰》,第22頁。
- ㉙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3<sup>e</sup> année, n° 2 (1988), pp. 291-293.
- ㉚ Gérard Noiriel, "Pour une approche subjectiviste du social,"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4<sup>e</sup>

année, n° 6 (1989), pp. 1435-1459.

⑩ Roger Chartier, “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4<sup>e</sup> année, n° 6 (1989), pp. 1505-1520.

⑪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no. 1 (1990), pp. 73-91.

⑫ 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在關於歷史分期的短論中稱受布羅代爾“長時段”(longue durée)概念的啟發,實則其“長中世紀”(Un long Moyen Age)與“長時段”根本不是一回事。參見雅克·勒高夫:《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楊嘉彥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⑬ W. G. Runcima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ele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ul Cartledge, “What is Social History Now?” pp. 24-26.

⑭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8, p. 114.

⑮ Miguel A. Cabrer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8年。

⑯ Miguel A. Cabrer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pp. xiv-xv; 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第8頁;第9~10頁。

⑰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pp. 75-92.

⑱ Robert Jütte, “Moderne Linguistik und ‘Nouvelle Histoir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Bd. 16, H. 1 (1990), S. 104-120.

⑲ Adrian Wilson, “A Critical Portrait of Social History,” in Adrian Wilson(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 175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p. 23.

⑳ 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第160頁。

㉑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㉒ Carlo Ginzburg, “Latitude, Slaves, and the Bible: An Experiment in Micro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3 (2005), pp. 665-683.

作者簡介:孫江,1963年10月生。南京大學學士、碩士,東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教授,現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著有《人種》(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商務印書館,2021年)、*Revisiting China's Modernity: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2020)、“근대 중국의 종교·결사와 권력”(學古房,2019年)、《重審中國的“近代”——在思想與社會之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博揚文化,2016年)、『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書院,2014)、『近代中國の宗教、結社と権力』(汲古書院,2012年)、『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院,2007年)等,撰有學術隨筆《學而衡之》(商務印書館,2023年)、《鏡像中的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主編“學衡爾雅文庫”、“學衡歷史與記憶研究叢書”、“學衡社會史研究叢書”、“學衡歷史與記憶譯叢”、《亞洲概念史研究》等。另擔任 *Cultu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 特邀編輯(Guest Editor), *Memory, Mind & Media* 編委,개념과소통編委。

[責任編輯 劉澤生]